



# 中國民族古文字

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



800746

# 中国民族古文字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

1982

北 京

# 中国民族古文字

## 目 录

我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的新阶段·····	史金波(1)
藏文·····	罗秉芬(12)
西夏文·····	白 滨(20)
彝文·····	陈士林(34)
东巴文·····	杨甲荣(38)
白文·····	赵衍荪(44)
傣文·····	张公瑾(51)
方块壮字·····	张元生(64)
突厥文·····	陈宗振(73)
回鹘文·····	黄润华 胡振华(81)
契丹文·····	贾敬颜(85)
女真文·····	颜 华(109)
八思巴字·····	照那斯图 杨耐思(115)
察合台文·····	安瓦尔(120)
回鹘式蒙古文·····	道 布(125)
满文·····	富 丽(131)
训民正音·····	黄有福(141)
佉卢文·····	马 雍(159)
于阗文·····	黄振华(163)
焉耆—龟兹文·····	李 铁(170)
粟特文·····	黄振华(175)
古代少数民族文字论著目录(初稿)·····	冬 青(189)

# 我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的新阶段

史 金 波

我们伟大的祖国长期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兄弟民族在祖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历史悠久、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是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各式各样的少数民族古文字，是我国民族文化宝库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各民族发展文化事业起了重要作用。

解放前，我国只有少数专家从事民族古文字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然而从专业队伍和科研成果两方面看，都还是很薄弱的。解放后，在这方面又取得了新的成就。特别是近些年来，在国家科研、文博、教育等部门的重视和关怀下，经过专业和业余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这一学科有了较快的发展，形成了一支有一定水平的科研队伍，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可以说，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形成了百花齐放，初步繁荣的局面。其具体表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 一、文种范围和研究内容不断扩大

过去研究民族古文字的专家在资料缺乏、条件很差的情况下，对一些文种作了开创性的研究。近些年来，民族古文字研究涉及的文种越来越多。1980年在承德召开的中国民族古文字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就有从事十六个文种的研究人员参加。这些文种是：佉卢文、突厥文、焉耆一龟兹文、于阗文、回鹘文、察合台文、古藏文、西夏文、彝文、纳西文、老傣文、契丹文、女真文、八思巴文、回鹘式蒙古文、满文。后来在编辑《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论文集）的过程中，又有人介绍和研究朝鲜训民正音文字。在

编辑《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册》和《中国民族古文字》两种资料时，又增加了粟特文、白文和尔苏文。现在研究会的会员中，还有人从事水文的研究和整理。目前，已有二十二种民族古文字成为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了。

各文种的研究内容，也越来越深入广泛。现在民族古文字的研究不仅仅限于文字的创制、文字类型、文字构造等课题，而且还涉及到各种文字所记录的语言本身的结构。民族古文字记录的是古代民族语言，因此民族古文字文献及其研究成果对研究古代民族语言就十分重要，特别是对于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少研究人员还有目的地利用民族古文字文献所提供的资料，加强了对古代民族社会历史和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比如敦煌所出古藏文文献的翻译和研究对藏族历史、文学、宗教及民族关系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满文老档》的重新整理、翻译，为研究满族入关前的历史、社会性质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材料；明代女真文永宁寺碑的研究成果，可以作为考证边疆沿革问题的确凿证据；西夏文碑文、发愿文、译经图的译释为研究西夏历史、佛教史找到新的资料；傣文有关文献的研究对当时傣族地区天文、水利的考察具有重要意义。凡此种种，都说明民族古文字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与民族语言、民族历史、民族考古的研究有直接关系。今后，逐步扩大民族古文字的研究范围，使之更加适应当前学术界的需要，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 二、重要文献资料的整理有较大进展

我国民族古文字种类较多，有大量的民族古文字文献被保存下来。尽管这些文献在时代的早晚、数量的多寡以及内容的侧重等方面可能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内容十分丰富，学术价值较高。近些年参加民族古文字文献整理的人员较多，进展也较大。

最近几年，新疆出土了包括多种民族古文字的大量文献，其中有不少是学术价值较高的重要资料。这些文献引起了有关单位的重视，现正由国家文物局的有关部门、新疆博物馆、吐鲁番文

物保管所等单位组织力量进行整理。

八思巴文和回鹘式蒙古文文献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的同志全面地进行了整理、注释和研究，并分别编著成《八思巴字蒙古语资料汇编》和《回鹘式蒙文文献资料汇编》两书，即将出版。

契丹文和女真文文献资料，近些年也有新的发现，并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内蒙古大学的研究人员汇编成书。

彝文的文献十分丰富。解放后，四川、贵州、云南等省成立了专门机构，在搜集、翻译、整理彝文文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近几年，中央民族学院和贵州、四川等有关单位共同协作，在老专家的指导下加强了这一工作。

对《满文老档》的翻译和整理，以前国内外都曾作过很大努力。这些年又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其它有关单位的业务人员重新进行整理、翻译，提高了译文的准确性，在文献整理的质量方面作出了贡献。

在大量的民族古文字文献中，有一些有重要价值的专著，它们或是某一文种的经典著作，或为重要的字典辞书，或为难得的历史传述，或为长篇的文学巨著。一些研究人员在一般文献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些专门的著述进行了重点整理、校勘。如王尧与陈践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黄不凡的《尚书四篇藏文译文的初步研究》、照那斯图的《八思巴字百家姓校勘》、哈密提、魏萃一等人翻译整理的12—13世纪维吾尔文献《真理的入门》，胡振华和黄润华对《高昌馆来文》的理整，中央民族学院整理、岭光电翻译的彝文本刻本《教育经典》，吴峰云的西夏文《番汉合时掌中珠校补》，新疆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对《突厥语大辞典》的翻译、整理等等。目前不少重要民族古文字文献著作的整理工作正在进行，可望今后会做出更多、更突出的成绩。

### 三、专题研究不断深入

在前人研究的成果和不断积累资料的基础上，不少民族古文字研究人员深入钻研、勇于探索，写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论文。

如耿世民、胡振华、陈宗振、阿不力米提·肉孜、库尔班·外力、热外都拉、李经纬等人对突厥语词典、突厥文文物以及回鹘文文书、佛经、碑铭的研究；王静如、李新魁、白滨、黄振华、李范文、陈炳应、张思温、吴峰云等对西夏文字、文献、碑刻、经卷、辞书的研究；陈述、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弗礼、胡振华、阎万章、郑绍宗、高路加等人撰写了研究契丹文字的解读方法、碑铭、墓志释读等方面的论文；金启琮、贾敬颜、黄振华、穆鸿利、道尔吉、和希格等研讨女真文字、语言、文书、石刻、银牌，写出了数篇论文；蔡美彪、照那斯图、亦邻真、杨耐思、郝苏民、昂奇等人分别对八思巴牌、印、字母、文献撰写了不少论文；道布、亦邻真、包祥、布和贾尔嘎勒等对回鹘式蒙古文的字母、语言、碑铭进行了研究；王尧、黄文焕、觉顿·仁钦扎西、黄不凡、罗秉芬、安世兴、王青山、周季文等人对古藏文文书、题记、词语、正字法、语法、分别写出了论文；张公瑾、刀世勋、周耀文、巫凌云等对傣文的文字、贝叶经、文书等分别进行了研究；玉麟、王明琦、季永海、富丽等人对满文文字、文献、辞书进行了研究；马学良、陈士林、李民、余宏模、陈英、武自立、纪嘉发等对彝文的产生、文字、碑刻、文献撰写了研究论文；方国瑜、和志武、姜竹仪对纳西东巴文的文字构造、特点、语言分别撰文进行了探讨；季羨林、李铁、依不拉音·穆提依对吐火罗文（焉耆——龟兹文）、粟特文进行了研究。这些论文中有的依据新发现的资料对某一课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的则对已经研究过的资料重新进行深入研究，得出新的研究结论。总之，这些论文既是新的研究成果，又是今后深入研究的基础。

随着民族古文字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研究人员还写出了具有相当水平的专著。这些著作多为作者长期研究所得，学术价值较高，对各文种的研究进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纳西东巴文是处于原始图画文字和象形表意文字中间的一种过渡性文字，在文字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81年由云

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纳西象形文字谱》，是我国纳西族老专家方国瑜几十年潜心研究的重要成果。由日本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出版的《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是老专家傅懋勤的新作，他在四十年代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第一次全面地研究东巴文《白蝙蝠取经记》全文，对其进行了音译、直译、意译和解说。他还根据最近的研究，指出这种文字和单个单个的象形文字比较有以下几个特点：(1)行款大体由左向右书写，但不太固定，(2)往往据上下文字义形成新的字形结构，有因文生义、字无定体现象，(3)有些复合字体互相依赖，(4)复合体中单字的上下偏正，以象形化原则表达意义，(5)一个形体表示几个意义。他认为这种文字应是图画文字，再向前发展才是象形文字。

老专家金光平(已故)、金启踪父子合著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对女真文文献资料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对女真文字的创制、使用、文字构造、语音、语法等方面作了全面的探讨，书末还附有五种重要女真文碑刻的译释。这是我国近些年来女真文字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内蒙古大学道尔吉、和希格两人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将合印成书公开出版，共三十万字。道尔吉的《女真语音初探》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注音汉字的音值构拟入手，以确定《女真译语》所代表的明代女真语音系统，总结出女真语音发展的一些规律。和希格《女真馆杂字、来文研究》着重分析了《女真译语》中杂字和来文的错谬问题，并重点探讨了杂字与来文的关系。他们的研究成果为女真文的研究作了一定贡献。

近年来，我国契丹小字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这一工作主要是由内蒙古大学清格尔泰、陈乃雄、邢菲礼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刘凤翥、于宝林等同志共同组成的契丹文研究小组完成的。他们广泛地搜集资料，对契丹小字逐字进行分析，找出378个小原字。在解读时采用了从契丹文文献中的汉语借词入手，推定一些小原字的音值，使这些音值在其它文献中得到验证的一整套方法。他们用这套方法确定了130多个小原字的音值，



释出契丹词语400多条,发现了契丹语的元音和谐律和一些附加成分,将契丹字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内蒙古大学学报》1977年第4期以专号的形式集中地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十一世纪初创制的西夏文,引起了国内外一些专家的研究兴趣。西夏文文献很丰富,其中《文海》是一部价值很高的韵书,保存至今的残本有三千多个字条,每一字条下对该字的字形构造、字义和字音都有确定的解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的三个同志对这部重要文献进行了整理研究,写出了《文海研究》一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参考了国外研究成果,对原书三千多个字条的近十万字的注释全部进行了翻译,并对其中每一个字都作了索引。他们还对原书的错漏和国外专家的误录、误译、误释作了比较认真的校勘,并且根据《文海》中的丰富资料,对西夏文字构成的特点、《文海》的语音体系以及《文海》所反映的西夏社会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八思巴字是元代创制,可以用来译写多种语言的文字。最近几年,照那斯图系统地搜集整理了八思巴字文献资料,并进行了深入研究,解决了八思巴字篆体字的释读问题。同时根据大量的资料,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八思巴字蒙古语资料汇编》,这部书不仅集八思巴字资料之大成,而且有考证和注解,是一部有价值的研究论著。道布编辑的《回鹘式蒙文文献资料汇编》也是同样性质的科学著作。

所谓吐火罗文有两种,A种为焉耆文,B种为龟兹文。1975年在新疆焉耆发现了44张(每张两面)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老专家季羨林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第一部成果《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已经发表在《民族语文》1982年第4期上。其余部分正在继续研究中。

#### 四、新的文献资料陆续发现

我国的民族古文字文献本来就十分丰富,尽管有些文种的一部分文献流失国外,但保存在国内的依然不少。这为我国的民族

古文字研究工作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值得提出的是，近些年来我国不少地区陆续发现和出土了一批民族古文字文献，有的文献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新疆地区近些年先后出土了佉卢文、粟特文、于阗文、突厥文、吐火罗文、回鹘文等文献，其中有世俗文献，有佛教文献，有纸书，也有木牍，内容十分丰富。

近些年在东北、内蒙古、河北等地先后出土了有价值的契丹文墓志以及牌、印等。这些石刻和牌、印的发现，使原来不多的契丹文文献有了新的补充，为契丹文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西夏文的重要文献也多有发现。如故宫博物院所藏明初《高王观世音经》和保定韩庄出土的明代中期石幢的发现，为研究党项族后期历史提供了两种关键性资料。敦煌西夏文题记、西安发现的西夏文佛经、题款、符牌为研究西夏佛教和历史补充了有价值的资料。银川贺兰山下西夏皇陵的清理和发掘，提供了上千块西夏文、汉文残碑块，有可能为西夏历史的研究提供重要史料。

八思巴字的印、牌陆续有所发现。照那斯图就是根据过去已有的和新发现的印章，系统地研究了篆文字母。更值得提出的是在广东南华寺发现了八思巴文圣旨，这一重要文献的发现解决了八思巴文字母表中的一个悬案，并且增补了禅宗六祖大师惠能的谥号。

西夏张掖黑水建桥碑，原来一些专家认为一面书写汉文，一面书写西夏文。近经有关人员实地调查，才知是一面汉文，一面为藏文。这是迄今发现的第一块宋代藏文碑刻，对古藏文以及西夏史的研究都是难得的好资料。

纳西东巴文的资料经过这些年的搜集，也有了很大收获。云南丽江县成立了专门搜集、整理纳西文的机构，大大促进了这一工作的进展。

彝文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工作，投入的力量更多。近些年，除搜集到不少书籍外，还有一些新的碑文发现。比如明代碑文的发

现对考证彝族当时的社会情况有重要价值。

更为可喜的是不少专业研究人员，直接参加了民族古文字文献的调查、搜集工作。这些同志当中，有的主动与文博部门联系，互相配合，或清理库存，或发掘现场，获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献资料。有的则千里迢迢奔赴边疆，在考古部门配合下，走访遗址，搜寻文献，捶制拓片，抄录题记，在深山荒漠中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在民族古文字的研究事业中滴下了他们的汗水。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得到人们的赞赏。

#### 五、少数民族出身的研究人员成果突出

少数民族出身的研究人员对于本民族的古文字研究有较深的感情和浓厚的兴趣。他们一般都懂得用该种文字记录的民族语言或与其相近的语言，熟悉民族古文字文献，因而也能够较快地取得突出的成就。这些人中有老一辈的专家，他们早就对民族古文字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方国瑜(纳西族，研究纳西文)、清格尔泰(蒙族，研究契丹文)、金启琮(满族，研究女真文)等。近些年有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作者在民族古文字研究工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如和志武(纳西族，研究纳西文)、照那斯图(蒙族，研究八思巴文)、道布·亦邻真(蒙族，研究回鹘式蒙古文)、库尔班·外力、多鲁坤(维族，研究回鹘文)、哈密提(维族，研究察合台文)、安瓦尔(柯尔克孜族，研究察合台文)、哈西木(维族，研究突厥文)、刀世勳(傣族，研究傣文)、武自立、纪家发、罗家修、陈英、余宏模(彝族，研究彝文)、安世兴(藏族，研究古藏文)、玉麟(锡伯族，研究满文)、赵展、富丽(满族，研究满文)、张元生(壮族，研究方块壮字)、徐琳、赵衍荪(白族，研究白文)、吴支贤、石尚昭(水族，研究水文)等等。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少数民族研究人员在民族古文字研究方面取得更多、更突出的成绩。

#### 六、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的成立促进了民族古文字研究工作的进展

研究会的成立，使分布在全国各地、研究不同文种的一百几

十名专业和业余研究者有了自己的学术团体，开辟了一块共同培育科研成果的园地。会员们的研究情况和心得可以得到有组织的介绍和交流。各文种的研究人员由于加强了了解，因而开扩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借鉴了研究方法，推动了整个学科的进步。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过去这一不被人重视的学科，形成了一支有组织的科研队伍，越来越引起社会科学界的重视。社会上一些有关民族古文字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断与研究会进行联系。

研究会成立后，首先把各文种向社会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我国民族古文字各有自己的历史，分属多种不同的类型，各成独立的体系，但因是“民族”的，又是“古”的，所以很多人对它不甚了解，就是在社会科学界，也有很多人不太熟悉。研究会成立以后，为了使这一学科引起更多人的重视，有目的地向广大读者介绍了各民族古文字的概况，其中包括文字的创制产生，使用发展、结构特点、文献文物、研究情况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八〇年十月在民族文化宫举办的《中国民族古文字展览》。这个展览用大量文物文献向国内外观众生动地展示了十六种民族古文字的概况，参观者达一万二千多人次，其中包括二十多个国家的外宾。今年，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秘书处又编印了《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册》，用简短的说明和近百幅图片介绍了二十一种民族古文字。即将出版的《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一书，是由研究会编辑部编辑的。

研究会成立后，对有志于研究某一文种而有具体困难的同志，给了一些必要的鼓励和支持。有的文种过去很少有人研究，一些同志在缺乏资料和经费的情况下，自己创造条件，努力搜集资料，做了大量工作。研究会与他们在业务上加强了联系，同时把国外介绍和研究这一学科的资料送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在这一文种的开创性的研究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研究会在这方面的的工作做得还不够，有待进一步加强。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简介不难看出，近些年来我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确实做出了可喜的成绩，出现了初步繁荣的局面。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各文种都还存在一些需要认真解决的重要课题，有的文种实际上处于刚刚开始研究的阶段，有的文种虽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但离完全解读和利用文献做进一步研究还有相当一段差距。我们还应该看到国外对不少文种的研究也有了相当的基础，或掌握了比较丰富的资料，他们的进展也比较快。因此，我们应该努力工作，使我们的研究工作取得更好的成绩。我们认为，今后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以下三个方面：

### 一、大力加强资料工作

科学研究工作要建立在大量的、可靠的资料基础之上。民族古文字研究因一般离开活的语言、文字较远，文献资料就显得更加重要。今后我们要把资料的搜集、整理、校勘、翻译、注释等工作放到重要位置上。研究会准备组织编印一些基本资料和目录索引。我们应该经过一个时期的工作，对所研究的各文种现存的主要资料，做到心中有数，专业研究人员应逐步掌握本文种的基本资料。对国内外研究情况，也应作为经常的工作，随时掌握。

### 二、选择适当的专题，深入进行研究

如果说基本资料是研究工作的前提和基础，那么，深入的专题研究则应是我们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在民族古文字研究工作中有份量的研究专著和论文还不够多，各文种专题研究的进展也不平衡。各文种的研究人员可以根据本文种的资料情况，在尚未解决的问题中选取一些基本的、急待解决的专题，组织力量深入进行研究，力争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取得较为突出的成绩。不应再停留在可有可无的一般论述上，而应力求写出具有新资料、新见解的作品。当然，这种设想或计划应建立在实事求是、切实可行的基础上。

### 三、加强联系和协作

我们民族古文字研究工作者，虽已形成一支队伍，但人数还

不是很多，如果具体看每一个文种，一般只有几个人甚至一、两个人进行研究，他们又往往分散在全国各地，倘若互相之间不通消息，研究计划可能会有不必要的重复，也可能会留下空白。此外，在掌握国内外资料 and 情况方面也互有长短。因此，加强会员之间，特别是同一文种研究人员之间的相互联系或协作是十分必要的。从研究方法上看，每一个文种、甚至每一个人都可能有所不同，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有时能使某一文种的研究取得较大的进展，因此，也应大力提倡会员之间和各文种之间研究方法的借鉴和交流。

总之，我们应该群策群力，努力工作，互相支持，在党的十二大精神鼓舞下，在国家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总的形势下，开创民族古文字研究的新局面，使我们这一学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 藏 文

罗 秉 芬

## 一、藏文的创制及修订

据几部有影响的藏文史籍记载，公元七世纪中叶，吐蕃三十三辈法王松赞干布（？—649）在位时，派遣他的近臣屯米阿努之子，屯米桑布扎赴天竺学习梵文和佛法。屯米桑布扎走遍天竺，最后抵达南方，向精通各种文字的婆罗门大师里津学习多种文字，向大班智达拉日僧格学习声明学。学成之后返回吐蕃，遵照法王旨意制定藏文。屯米桑布扎从梵文的三十四个字母中剔除藏语中没有的音十一个，又根据藏语的实际增补了七个，制定藏文辅音字母共三十个。又从梵文的十六个元音字母中择出四个与藏语相符的，制定四个元音符号。

藏文的三十个辅音字母，前二十个是按发音部位相同者，每四个字母编成一组；后十个字母编成两组半，共七组半。字母的编排方法与梵文天成体字母有类似之处。从辅音字母在藏文音节结构中的地位看，每一个音节必须有一个基字，三十个辅音字母均可作基字。基字前面可以加前置字，三十个字母中有五个字母能作前置字。基字后面可以加后置字，三十个字母中有十个字母能作后置字。基字上面可以加上置字，下面可以加下置字，作上置字的只有三个字母，作下置字的有四个字母（用藏文转写梵文时还可以加上表示长元音和送气音的两个字母，所以如果算上这两个字母，下置字在古文献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是六个而不是四个）。四个元音符号有三个写在基字上面，一个写在下面。自左向

右横写，有的音节是字母上下迭写的方法表示。音节与音节之间用一小点隔开，作为分音节的符号。书题开头、篇章开头有一个起始符号；句子的末尾划一竖道作句号；章节末尾划两个竖道作章节结束号；全篇文章或大段落的末尾划四个竖道作文章结束号。

关于藏文字母的字体来源问题，藏文史籍各家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藏文字母的字体是根据梵文的“兰杂”体制定有头字（楷书），根据瓦杜龙字制定无头字（行书）。再一种说法是：屯米桑布扎当时仿梵文的纳卡热字及迦什弥罗字的字体创制了有头字，仿瓦杜龙字创制了无头字。而本教的历史书则提出另一种说法“认为那种说在松赞干布王即位之前，‘西藏是因为本教盛行，所以无文字’的看法不符事实；藏文最初是由大食国（今伊朗）的一种叫做“崩伊”（叠字）的文字首先转为象雄古文字，再由这种古象雄文转为“曼扎”文，最后逐渐转化为藏文的有头字和“竹麻”（有头字的另一种字体）。

无论史学家们对藏文字体来源问题有多大的分歧，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字体确实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有头字”和“无头字”。有头字相当于正楷，也就是后来的印刷体，从木刻、石刻到现在的铅字排印都使用这种字体。无头字相当于行书，各种文书缮写工作使用这种字体。无头字又可细分为：（1）“大字母”体——字母大字，为练习行书第一阶段的字体。（2）“朵酒”体——加有上下置字的大字，为练习行书第二阶段的字体。（3）“粗仁”体——长脚体行书，为练习行书第三阶段的字体。（4）“粗通”体——短脚体行书，为练习行书第四阶段的字体。（5）“粗穷”体——小草书，行草书，较“粗通”体小一半，为练习行书第五阶段的字体。（6）“秋”体——草书、狂草，是练习行书第六阶段的字体，“秋”的愿意是敏捷、闪动，这种字体书写方便迅速，故此得名。此外，无头字还有一种字体叫“珠杂”，它的写法是笔画转折处棱角突出，相当一种美术字。用这种“珠杂”体缮写的文献典籍很多，故深受人们的喜爱。



关于藏文典籍勘正，正字法修订问题，据一般史籍记载，藏文于七世纪创制起，至十五世纪初叶的八百多年之间，先后进行过三次厘定工作。第一次厘定指的是屯米桑布扎仿梵文的一种字体，将西藏的古老文字改创成如今我们所能认读的藏文。第二次厘定指的是九世纪初叶，藏王热巴巾时，以噶、觉、尚三位大译师为首的一批译师，根据当时藏语发展的情况，进一步修订了藏文译语和正字法。第三次厘定指的是，从十一世纪末阿里王意希畏时的大译师仁青桑布开始，至十五世纪初叶佛教复兴时期三百多年间，共有一百六十多位大译师先后从事佛经翻译和勘正工作的过程中，对藏文的译语和正字法所进行的一些零星修订。

关于第一次和第三次厘定情况，史籍上记载的不够具体，而第二次厘定的情况却有较详细的记载。如藏文《丹珠尔》杂部的《语合二卷》记载了有关第二次厘定的基本情况，收录了这次厘定译语的法令全文和所厘定的译语词目。该文献一开头明确指出这次厘定工作开始于藏王赤德松赞（804—815在位）时的马年（即公元814年）。而过去一般史学家和藏族史研究工作者们都将这次厘定的时间，误认为藏王赤热巴巾（815—841在位）时的马年，（即公元826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误解呢？这并不难解释，因为814年是赤德松赞王在位的最后一年，从他开始而未能完成的藏文厘定工作，理所当然地由他的儿子赤热巴巾王继续完成，而且大量的实际工作是在这个时期进行的，因此，人们很自然地把马年看成是赤热巴巾时的马年，即826年。

关于第二次藏文厘定的内容，《贤者喜宴》一书有较详细地记述：“……废弃其中难懂不便读的古词，代之以易懂便读的新词，使之符合地区与时代，为了减少字母（指音节中累赘的字母），将双唇鼻音字母的下置字颚化音字母、再后置字的强化音字母、单根基字垫音等一并取消。”从这个材料可以看出当时的厘定工作牵涉面相当广泛，厘定的内容也相当深刻。